

张向明
年
西藏
工作
实录

55

张向明

年

西藏工作实录

55



丁

张向明 55 年西藏工作实录

张 向 明

2006 年 5 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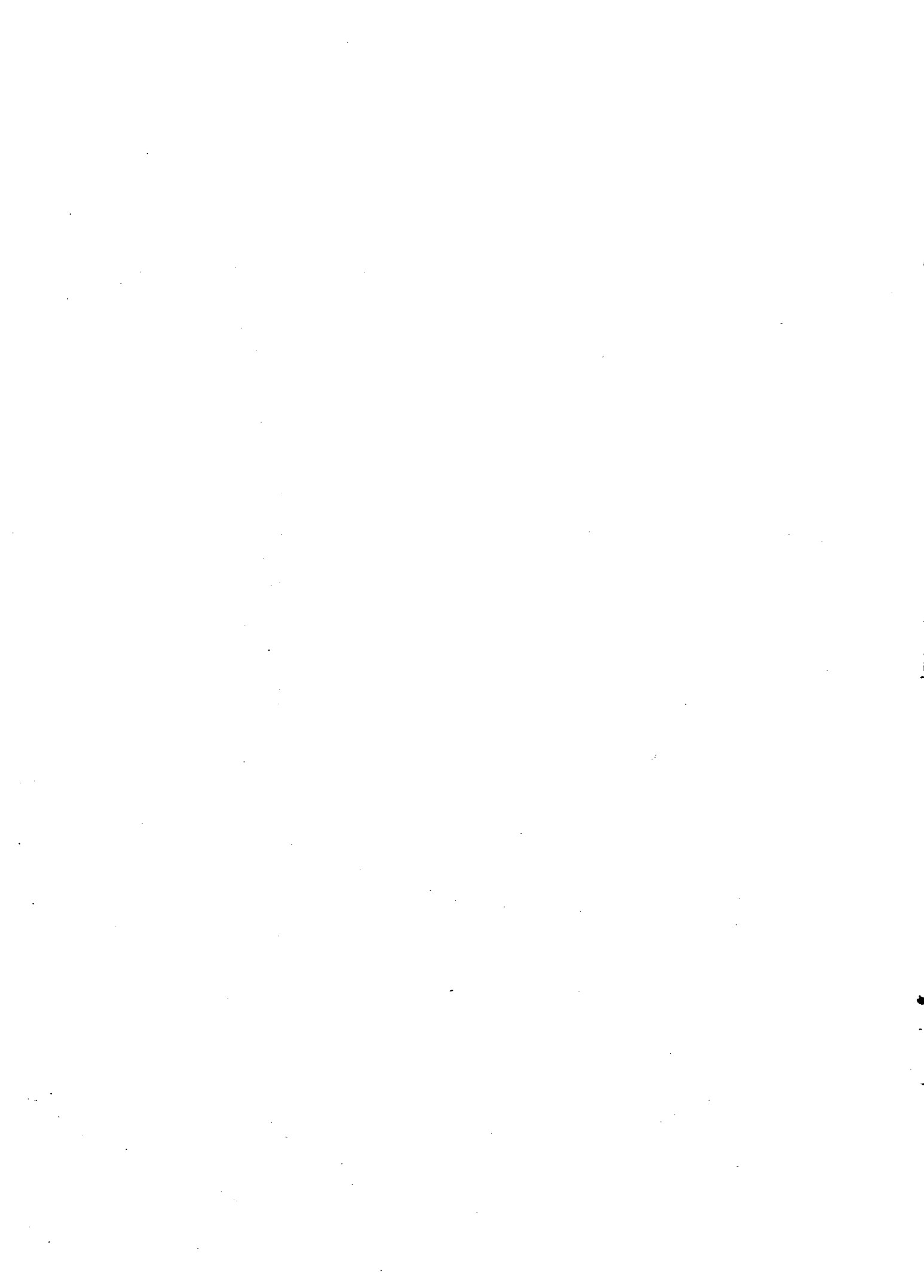


作者简介

张向明 原名张佳兴，广东南雄县人，生于1919年10月初三。高中毕业。1938年3月5日参加广州中共地下党为党员。因丢失组织关系，1938年12月于陕北公学分校重新入党。陕公分校结束，调中央青训班速记班和中央组训班学习。39年分配至新四军第六支队，到豫皖苏边区邳县《夏声报》任编辑、夏永碭中心县委秘书，五区区委书记。边区部队撤退皖东北后，调四师锄奸部任秘书、科长。日本投降后，任宿西县公安局长。豫皖苏军区1946年成立，任军区政治部委员。1948年任18军保卫科长、副部长。1952年1月任西藏工委社会部副部长。1953年任工委政研室副主任、工委统战部副部长、工委宣传部代副部长、工委副秘书长。区党委正式成立后，任秘书长、常委、副书记。1984年任中共西藏自治区顾问委员会副主任，主任。1990年9月离休。

张向明在国家民族灾难深重的时刻，在共产主义旗帜和革命进步思想的感召下，毅然奔赴革命战场。他参加革命后，紧紧追随中国共产党，听从党的调遣，服从党的命令，认真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，时时处处从各方面严格要求自己，迅速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革命战士，为祖国的解放事业和中华民族的独立作出了贡献。在被党培养、提拔担任领导干部后，更是以身作则，吃苦在前，享受在后，一身正气，两袖清风。张向明对同志对党对人民、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，他始终善于积极加强政治学习，积极领会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，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，多次受到上级表扬、表彰和奖励。业绩入编大型文献《开国将士风云录》。

摘自《开国将士风云录》(中共党史人物传记委员会制)



目 录

张向明 55 年西藏工作实录.....	1
一、重返十八军、进军西藏.....	7
二、从康定到甘孜——西藏工作团的工作.....	13
三、甘孜的一年工作.....	19
四、张国华同志在甘孜的工作报告.....	24
五、离开甘孜——继续进军西藏.....	30
六、十八军主力部队抵拉萨.....	34
七、陪同西藏参观团赴京.....	37
八、与李维汉部长的谈话.....	42
九、陪同西藏参观团在全国各地参观.....	46
十、返乡省亲、再返西藏.....	51
十一、中印边界材料的整理工作.....	55
十二、陪同达赖代表团赴京.....	59
十三、赴康区考察民主改革的情况.....	67
十四、1957 年的大收缩与 1958 年的党内整风.....	70
十五、1959 年的西藏叛乱.....	80
十六、平叛与民主改革.....	85
十七、下乡进行西藏社会调查.....	90
十八、关于十世班禅的问题（上）.....	96
十九、范明甄别事件.....	99
二十、中印边界战争.....	104
二十一、赴扎东“特委”工作.....	107
二十二、在扎东地区的考察工作.....	112
二十三、1964 年在扎东特委的工作.....	117
二十四、1965 年在扎东特委的工作.....	122
二十五、文革的冲击（1966~1969）.....	128
二十六、到“社改办”与重新工作（1970~1973）.....	136
二十七、农牧局的工作（1973~1978）.....	145

二十八、西藏的思想解放运动（1978~1980）	153
二十九、关于张学尧的案件	162
三十、阴法唐主持西藏工作时期（1980~1985）	168
三十一、“三个干扰”的泄密事件	178
三十二、李维汉关于平旺问题的讲话	186
三十三、关于十世班禅的问题（中）	192
三十四、第二次西藏工作座谈会（1984）	204
三十五、伍精华主持西藏工作时期（1985~1988）	212
三十六、“9.27”、“3.5”事件——80年代末拉萨骚乱	225
三十七、乔石进藏视察	235
三十八、中央派工作组进藏	250
三十九、胡锦涛同志进藏工作（1990~1995）	256
四十、编写西藏党史	266
四十一、写给区党委的报告及附件抄录	271
四十二、组织史的结论及范明问题的凸显	281
四十三、西藏大记录定稿会	286
四十四、事情终于水落石出	292
四十五、一份写给区党委的内部报告	295
四十六、关于范明的《班禅大师爱国业绩纪实》	309
四十七、关于十世班禅的问题（下）	315
四十八、老干部聚会及听取陈奎元同志讲话	326
四十九、为阿沛、经武、国华等同志写传记	339
五十、关于《西藏风云》电视连续剧	345
后记	353
附录一	354

一、重返十八军、进军西藏

十八军打罢湘南战役，军部开进绍阳市，这时听到一个消息说，我们军的任务变了，要入川，接管川南。这个消息让大家很兴奋，原来在途中听说我们接管的地方是贵州，大家听说要去贵阳都不太高兴，愁眉苦脸的，认为贵州这个地方太穷了，人说贵州“地无三尺平，人无三分银，天无三日晴”，我们怎么去了这么个地方，我们过江后，走的都是些小地方，最后的结果是到贵阳，这个结果让大家有些扫兴。到绍阳后听说是去川南，大家又高兴起来了。

在绍阳住了几天后又出发，途中听说去川南后，干部们分配地方的安排方案已经出来，班子也明确了，川南区党委的书记当时就听说是李大章、彭涛，行署主任是张国华，自贡市的市委书记是谭冠三，郭影秋是行署的副主任，我当时是到自贡市当公安局长，我听了以后也很高兴。

在去贵阳的路上，我们就把要去川南的人拉了出来，离开了军部，但军部的其他领导同志还留在军里面，拉出来的只是我们这些要下地方的同志们。李大章、彭涛及我们这些要南下的干部，走到了一起。到贵阳住了几天后，我们就入川了。

入川以后先是到了泸州。一同抵达泸州的还有我们军的夏仲远、王静之等同志，另外还有几位同志也要到县里去作县委书记，我们这些人到泸州后，没有休息，马上就出发去自贡市。当时谭政委没有去，去自贡市的有王静之，他去市委当宣传部长，还有一位姓杨的同志，叫什么名字我已经记不得了，是位南下干部，原是四川地下党的同志，他的职务是组织部长。

到市委时，我随身只带了阮钟虎，他在豫皖苏时是个特务，被我们抓捕后关进了监狱，因为坦白得好，后来又放出来使用，就放在我们的保卫部里控制使用。入川要去自贡市时，王华说，你把他带上吧，他还可以用，所以我也只带了他，其他就没有带什么干部。当时已经有不少干部南下，我去时已不再需要带什么干部。

我们一到自贡市就去市委报到，市委接待我们的竟然是我过去的一位熟人，他叫曾谋。1940年我在豫皖苏工作时，曾谋就与我共过事，当时他是县委的部长，那会我在县委办报纸，办的报纸名叫《夏声报》，我任主编，归属于他的领导。因为工作，他到我的编辑部来过好几趟，《夏声报》当时办得还有些名气。他后来到地方上去了，我回了部队。因为我们有这么一层关系，所以在自贡市碰上时，我们俩都很

高兴。

不过当时顾不上说什么话，他立即就带我去了公安局。那时自贡市公安局还叫警察局。老警察局的对面是一座五层高的楼房，楼房的牌子上写着“永丰银行”。曾谋把我和我带来的人安排在这座五层楼上办公，对面就是警察局。

这个时候，自贡市的公安局已经有了一个班子，当时的副局长叫王星垣，是位南下干部，他比我早进公安局几天，我大概是十二月十几日去的，他们在十二月五日时已经来了。他们来了之后，在自贡市公安局下面建立了三个分局，一个是贡当分局，一个是自流井分局，还有一个大山区的分局。王星垣还兼了自流井分局的局长。

王星垣首先给我介绍了自贡市的情况，他说自贡这个地方的情况很复杂，自贡市在四川是一个很重要的城市，除了重庆、成都，就属它了。自贡市之所以有这么大的名气，还因为它是一个盐都，出井盐。国民党时期为了管理井盐，专门成立了盐务局，盐务局局长的位置比自贡市市长的地位还高，因为自贡市财政收入一直靠盐务局。国民党在这个地方的基础也比较雄厚，据王星垣介绍，成都战役之后，国民党在这一地区留下不少残兵，他们被分散到各个地区。特别川南地区，乡下潜伏着不少国民党的武装，再加上这些地区原来的一些武装，形成一股势力，这是一个情况。第二个情况是土匪和帮会的势力，帮会主要是三番子，三番子在当地很有势力，特别是在自贡市，国民党的特务机关也在那里活动。原地方警察局只留下一个侦辑队，侦辑队的队长年龄已经很大，还有一个副队长，据说他还是三番子帮会里的一个头子。他在这个警察局呆的时间很长，对国民党内部的情况很熟悉。我们当时已经把他给接管下来了，但是对他又不很放心，情况大概就是这样。

我到公安局后没几天，工作就忙得不得了，那时自贡市市内的社会秩序很混乱，天天晚上都可以听到枪声，而且情报很多，地下党的各种关系都来送情报，但哪些情报是真实的也很难判断。敌人经常搞些恐吓活动，今天这里报警，明天那里报警，市区周围有他们的一些支队在活动，特务还从邮局寄来恐吓信，我刚到自贡市公安局就收到过恐吓信。侦辑队今天从这里搞到一批枪支弹药，明天又从那里挖出一些武器，有一些枪支还是崭新的，就被埋藏起来。总之，情况复杂，局面也有些混乱，弄得大家心里有些恐慌，当时我们部队的数量也少，驻扎在自贡市里的部队只有三个连，自贡市这么大，三个连根本就看不过来。外面到处都是流言蜚语，一会儿传明天敌人就要袭击自贡市了，一会儿又说是敌人要里应外合。我们的工作非常忙碌，每天晚上都熬夜，有时熬到下半夜还不能睡觉。我们没有几个人，吃饭就到原警察局，与警察局原来的职工、旧警察们一块吃饭，就这样过了一段时间。

这期间曾到泸州开过一次会，就在那次去开会的路上，我们还遭遇到一次伏击，伏击者化装成老百姓的模样在田里干活，突然端起枪来射击我们的车队，我当时带

了一个连，我们是一个车队，走着走着，枪声响了，听到枪响，我们前面的那辆车开始向后倒，倒着倒着车和车上的人都翻到田里。后来虽然把土匪打跑了，但不少人受伤，其实那次我们的人受伤主要是由于翻车造成的，还好那是个水田，人员伤亡得并不严重。

那年冬天，大山区分局抓获了一个名叫李东来的人，这个人据说是敌匪游击队的司令，人带来以后，我立即对他进行了审讯，审讯完第三天就拉出去枪毙了。这个人就是专门策划搞里应外合袭击我们的匪首。不过也许是我们精神上过于紧张了，总之，不应该那么快就把人给枪毙掉，但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。市委对这些情况也很重视。

我十二月份到自贡市公安局，第二年的元月就接到一个通知，说是十八军接到进军西藏的命令，所有十八军已下地方的干部，接到通知后要立即返回部队，一个不留。听到这个消息时，我感觉很突然，思想上也没有准备，我们十八军的干部马上就到了市委，看看我们该怎么办。

我们就要走了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曾谋找我说，你暂时不走，我们打算向区党委打报告把你留下，其他的人就让他们走好了，你可以不走。当时十八军干部在自贡市工作的有王静之和杨某某，老杨原本是地下党，他也曾经要求留下来，他年纪大，身体也不好，又是地方干部，希望能留下来也是人之常情，但领导没有同意，说是一个不留全都得走。如果确实进藏有困难，再调回来，现在是不能留的。接到这个命令以后，十八军的干部全部都走了，只有我一个人被曾谋给留下了。我当时也很矛盾，从我本人来说，我也不想走，想到曾谋说他已经向区党委打了报告，我认为这也是市委出于工作上的考虑，组织关系上的问题，不是我个人的事情，我还是听组织的吧，市委决定我留下我就留下，于是我又照常工作了。元月份接到命令，我没有走，一留就留到四月底，在自贡市又呆了三个月。

这期间，一些十八军的同志来来往往从自贡经过，带来一些信息，说十八军的军部已经从乐山到了新津，军部开大会时已经点了我的名，说张向明不回来，如何如何的，当时还听说分配到重庆工作的原52师政治部副主任樊其惠，因为没有返回十八军已经受到了处分，而且处分得很重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心里慌了，但曾谋一再安慰我，他说这个事情不要你个人负责，这事由市委负责，你放心，他当时找了十军政委王维纲，王维纲当时任自贡市市委书记。这个人我也见过多次，向他汇报过工作，曾谋也向他谈过，提出要把我留下，不过对这个问题他一直没有明确表态。看到这个情况，我推测军里并没有批准。不过当时我个人还抱有一些幻想，因为当时自贡市的形势的确很严峻，而我在那工作了一段时间，对情况比较熟悉，组织上一时也找不到合适的人，他们自然是很想把我留下的。这里主导思想还是曾谋在起作用，因为曾谋与我私人关系很好，他比较了解我，很想把我留下，我听说他已经

打算安排我去做市委秘书长了。就这样一直拖到四月底。

四月份，洪瑶阳和刘拮挺途经自贡去泸州报到，他们是已经被十八军分配回来的干部。他们路过自贡时带给我一个消息说，你要小心一点，谭二号已经在干部大会上点了你的名，看那个口气是很严厉的，你要做好准备，你还是要回去的。我听说以后，心里很震动。几天后果然收到一封电报，电报是直接发给我个人的，署名正是谭政委。电报的内容是：张向明速回，否则后果自负。电报的口气非常强硬。

曾谋知道了这封电报的内容后，立即来找我，他说看来你得走了。我说我马上就走。走之前，他约我到他家里去作客。他的家当时在盐务局对面河中间的一个小阁楼上，那里的环境很好。他当时也是一个人，还有随员。他把我领到他家里，我们就在他家里聚了大半天，那天晚上我没有回来。我们先是谈了一些过去的事，后来又谈到工作上的事，他说你走了以后，这里的工作怎么办，我说我走，工作也没有什么可交待的，只有一条，我带来的阮钟虎还是把他留下吧，他去西藏也不合适，这个人还是可以用的，我们来的这半年时间里，他为自贡做了不少事情，这个人还有些活动能力，可以用，也可以信得过，不会出什么问题，我自己就不带其他人了。当时我们军队干部走的时候都带走了一些人，一般是在当地找一些青年学生，特别是女学生带了去，我就不带人去了。曾谋说你这次进藏可是很艰苦的，我说这我知道，我思想上有准备。

其实我心里也挺清楚，我是不可能被留下的，十八军不会放我，所以对于离开，我一直是有准备的。曾谋说你还有什么要求，还需要带些什么东西，我说别的没有什么可带，我想带走两支枪，一支是崭新的二十响的驳克枪，国民党埋藏下来的，后来被我们挖掘出来，刚刚打开箱还没有用过的新手枪，另外再带一支左轮手枪，那支白金的左轮手枪我很喜欢，让我带上吧。他说可以，你都带上吧。我自己原来有一把勃朗宁小手枪，那是我来时随身带着的，这把枪我自己也还要带上的。也就是说我自己要带三只手枪。另外还有两个通信员，这两个通信员在我在自贡市工作期间一直跟着我，我说这就是我的要求了。曾谋说也没有什么好送给你的了，送给你一个狐皮袄，市场上买的，有些旧了，你带去可能有用。就这样我们俩一直谈了很久，他说进藏很艰苦，那边的气候高寒，有句口头禅说，正二三雪封关，四五六淋得苦，七八九正好走，十冬腊月学狗爬。就是用来形容西藏的气候特点的。

当时从我的心情来说，多少有些低沉，有些失落感，对十军的同志也多少有些羡慕。心里是有些活思想的。为什么偏偏要我们十八军进藏，为什么不让我进藏呢，是不是对我们十八军有些瞧不起？总之，当时是有些想不通，不过也没有什么话说，还是走吧。曾谋问我要不要去看看王维纲，说王维纲是位老革命，国民党白色恐怖时，他曾在北京坐过监狱，后来从监狱里逃跑时，还从很高的墙上跳下来，他是一位很坚定的党的干部，后来担任十军的政委。我说，算了，就不去看他了罢。

不过事情也很巧，就在我离开后，还是在火车上遇到了他，他当时要去哪里，我也忘了问他，总之在火车上碰见他了。他问了我的情况后，也没有说什么，大概这些情况他都是知道的。

就这样我到了成都，十八军在成都的办事处派车把我送到了新津。到新津以后，先见到了王华，把曾谋给十八军组织上的信转交给了王华。离开自贡时曾谋让我带上一封信，要我到新津后交给军党委，说一切情况在信里已经写得很清楚，他再三强调这件事你本人没有责任，是自贡市委的责任，是市委把你留下的，不要让这件事给你带来什么麻烦。这封信还是他亲自写的。

王华跟我谈了一下情况，说我的工作已经分配了，二月份时已经分配，当时分配到政策研究室，现政策研究室已经到了雅安，很快就要出发，你要马上赶过去。我说好吧。王华说先带我去见见政委，见见军长，然后政治部要开一次你的批评会，这个批评会是要做一下的。这样我们就一块到了二号谭政委那里，谭政委见到我也只说了一句：回来就好。然后到一号国华那里，也算是报到了，他也没有说什么话。从他们那里出来，我们去了政治部，在那里召开了一个我的批评会，政治部的几个科长，汤化陶、秦凤章等都参加了批评会，好像当时部长都没有参加。我当时情绪不好，我也不想作检查。实际上我那时的情绪很不好，也说不出什么来，只觉着我们十八军挺倒霉，抗战八年，解放战争三年，好不容易全国解放了，部队都进了大城市，正是应该享受我们的胜利成果的时候，偏偏让我们接受了这样一个艰巨的任务，而且这个任务可以说在时间上是无限期的，那时还没有听说有三年一换的说法，总之当时就觉着这一进藏啊，就不知道是哪一年才能是个头，所以情绪不好。批评会的时候，他们的火力也不大，我自己也不想说什么，我只是简单地解释了一下，说是自贡市委不放我走，当然你要说我不想留下也不是，我自己也确实想留下来，不过我也知道是留不下来，总之我绝不会因为这事而不回部队。所以那次会也没有说太多的话。

王华看我的情绪不佳，曾几次找我个别谈心。他说组织上曾多次给川南发电报，催促我返回，但川南一直没有回音。这边也估计到可能是自贡市挽留不放。后来先遣队到达金沙江，进军西藏迫在眉睫，这才把电报发给你个人，估计你个人是不敢违抗不归的。王华还谈到军部在乐山时的情况，据他说，当时干部的思想工作确实很难做，军长张国华、政委谭冠三同志都亲自做思想工作。一号（张国华）到52师作过一次报告，影响很大。他说，你们看不起西藏这块地方，但美国人、英国人、印度都在千方百计地想把它搞出去。现在藏军就布防在金沙江西岸，我们不把西藏拿回来，我们的国防边界就不是喜马拉雅山界，而是金沙江边，国土丧失百万平方公里，子孙后代都会骂我们啊！王华还谈到毛主席的一些指示，关于解放西藏，毛

主席有一系列指示，毛主席说：“解决西藏问题，不进兵是不行的”，“进军宜早不宜迟”；毛主席还提出了时间上的安排：“今年四月到达金沙江边，十月到达拉萨”等等。总之进军西藏的任务是非常紧急的。王华还谈到樊其惠、刘拮挺、洪映等人因负着留下来，有的已经受到处分，还有的也搞得很难看。

在新津我只住了半个月，就在那几天把婚事给办了。

在新津虽然只住了半个月，但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对我的思想有所触动。听说我们接受任务的时候，中央，西南局、西南军区等中央的领导同志和西南局的领导同志，也对我们十八军的进藏提出了一些政策，我逐渐感觉到我们这次进藏实际的意义还是很重大的，思想上开始发生了转变，中央这么重视，安排十八军进藏，实际上是很看得起十八军，据说刘邓首长在重庆开会挑选军长人选时，是很下了番工夫的，反复掂量权衡究竟谁能胜任这项工作，据说在整个二野的这些兵团里，挑来挑去，最合适的还只有十八军，选择十八军主要是看上了张国华这个军长人选，因为张国华在豫皖苏坚持斗争是出了名的，我们也知道我们在豫皖苏坚持斗争是很得到领导层的好评的。另外，刘邓首长之所以选择十八军进藏，还因为我们十八军的干部多。总之，听说了这些消息后，对我很有启发，发现事情并不像我开始想象的那样，让我们十八军进藏，并不是因为瞧不起我们，才把我们甩到了西藏。中央和西南局首长对进军西藏的重视，以及解放西藏意义如此重大，都开始让我在思想上有所触动。之后，我很快就去了雅安。

到雅安后，我的思想有了更大的转变，思想上之所以出现转变，还是因为到雅安后，见到阿乐和老穆他们，大家经常在一起讨论进军西藏的事，看到大家的热情很高涨，对我的情绪也很有影响。另外在这里我还看到李安宅、谢国安等藏学专家们，他们都是些名气很大的学者，年龄也已经很大，但也都积极地参与进藏工作。我觉着进藏工作看起来也并不是那么可怕嘛。当时听说，这些专家学者进藏，还是贺龙等中央领导同志推荐来的。我还听说我们西南军区作战部部长李觉也是自愿申请进藏的，听到这些，对我也很有触动。我感觉自己原来的那些想法是不对的，因为进藏工作而造成思想上的压力，实在是太不应该了。

在雅安没住两天，我们就出发了。我们整个政策研究室一块走，不过那时人也并不多。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开始时我们还能坐车，到了兰池子，车子就走不了了，车子过不了二郎山。当晚就在兰池子住下。兰池子实际上是一个小村子，村子在山沟里，背靠着大山，旁边有一条小河，小河水流湍急，水声也很大。村子里还有几间房子，政策研究室的几位老先生都住在房子里，当时杨殿甲、王银仙两位大概刚刚成亲，他们两位就住在寺庙里。我在靠沟口的地方搭了个帐篷。晚上入睡时总是伴着河流的水声，心情非常舒畅。

这个地方的名字挺怪，叫作倒插树，为什么叫作倒插树呢，据说是因为从山上

掉下来一棵树，树倒插在地上，居然奇迹般地活了下来，以后人们就称这个为“倒插树”。在这个地方，我们住了大约半个来月，大家都急着想赶路，不过，这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好多了，与那些藏学方面的专家学者、老先生们每天在一起有说有笑的，心情也很愉快。我的情绪已经完全稳定下来。

接下来就是过二郎山了。二郎山我们是靠自己的腿走过去的，行李用牲口驮。爬二郎山时我们并没有感觉到有多苦，甚至没有高原反应，其实这样走进去，反而有利于我们对高原的逐渐适应。到了泸定后，我们找了个铺子住了下来。在这里做过河的准备，准备过泸定铁桥。过泸定桥时，我们还特地凭悼了一下泸定桥，回忆起当年红军打泸定桥的故事，大家都很激动。

过了泸定桥，没有走多远就到了康定。

二、从康定到甘孜——西藏工作团的工作

到了康定，我的工作有了变动。组织上让我去西藏工作团工作。

西藏工作团好像比我们政策研究室早些到达康定。总之，我一到康定，就见到了中央西藏工作团的同志们。当时由韩戈鲁、马扎布从北京直接带进来一个西藏工作团，大约有几十个人，他们都驻扎在康定。我就被分配到他们这个西藏工作团工作。

西藏工作团的团长是天宝，最初中央西藏工作团的团长是韩戈鲁，他当时是中央民委的一个科长，他带来了三十多个人，那些人里有原蒙藏委员会的，还有蒙藏学院的一些学生，像格桑、杨益刚、扎西平措、群佩格桑、达瓦他们当时都是大学生，一个个看起来都很精干。另外也有一些汉族。这些人里面还有一些国民党的旧人员，他们一般都在西藏呆过，其中还有一位曾经是国民党的公安局长的，他们夫妇俩都是藏族。另外还有班禅办事处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原来一直跟随着九世班禅。这些人组编成了西藏工作团后，由天宝当团长，阿乐当副团长，我在一分团里担任党支部书记，杨东生在二分团，那会是不是叫二分团，我已经记不清楚了，反正他是在另一个分团里，他的那个分团里都是些年青的学生，是刚刚从康定各个县参军入伍的年青人，其中有好多是从丹巴参加进来的，有一些还是杨东生的老乡。总之，将这些新入伍的青年们组织成了一个分团。

一分团就住在康定北门外的一间房子里，我到一分团时，身边只带着申中正，只有我们俩。后来与这些学生接触多了，发现他们大多都是巴塘人，当时从巴塘有一批青年学生入伍，他们主要被分配到我们分团里来，所以我们这个分团的人数比较多。除了巴塘的学生们，还有从北京招收的蒙藏委员会的一批学生，听他们说，进藏的时候，中央简直把他们当宝贝了，周总理给他们作过报告，他们出发时，朱

老总还亲自来为他们送行，这些都深深地鼓舞着他们的工作热情。

韩戈鲁原是一位老民族工作者，对藏族同志很关怀，工作也做得很周到，据我在旁边观察，工作团的藏族同志对他的感情很深厚。我到西藏工作团以后，也很注意，因为这属于民族工作，我经常与韩戈鲁打交道，他当时任分团团团长，马扎布是副队长，那时还有几位大学生，都是汉族，像李宗青、梁汝诚等，他们从北京来。当时我也很注意了解他们的情况。

我记得从新津时出发时，领导就说过，我们要去的地方是个民族地区，是一个很特殊的地区，这个地区的民族与宗教问题特别突出，我们要特别尊重藏族的风俗习惯、宗教信仰和民族自尊心，也就是说在民族政策方面，我们要特别注意，不要在这方面出问题。所以这些方面，我一直都特别注意。

大约在七月一日党的生日那天，我们召开了庆祝会。庆祝会时搞了一个会餐，我们团里的会餐都是由团里面的藏族同志们操办，除了吃了些牛羊肉外，他们还做了一个面疙瘩汤，这个面疙瘩汤是用酥油煮的。那是我第一次吃酥油，最初闻到那个味道，我是有些吃不下，但我还是坚持把它吃完了，申中正可不一样，他一闻到那个味道就想吐，所以他不吃。不吃本来也是个小事，可是有些同学就批评他了，批评的话还说得很难听，甚至提到了大汉族主义，我也劝他，可劝也不行，他脾气很倔，就是不吃。总之，那一次搞得很不愉快。这事给我的印象相当深刻，我当时最深切的感受是民族干部的民族自尊心很强。

在康定住了一段时间以后，我们就准备出发去甘孜。这次工作团去甘孜的行军是与后勤部一块走的，当时的情形我还记得很清楚，大家都走路，不过我自己没有背被包，大概是有车子驮着吧。那会申中正跟着我。离开康定第一天，我们抵达二台子，当晚就住在二台子。二台子这个地方给我留下的印象太深刻了——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体味到什么是高原反应的滋味。那个地方在山腰，海拔实际上很高，我们当时不懂，在这种高海拔的地方留宿会很难受，那晚上我折腾了一宿，整个晚上都没有睡好，头痛得像似要裂开一样。当时我就想，才走到这里，高原反应就这么厉害，今后在西藏可很怎么过呀。我得承认，那天晚上的高原反应让我感觉到了一些威胁。奇怪的是快到天明时我又睡着了，醒来以后，症状反倒消失了，人也变得轻松起来。

接下来，我们爬山，二台子离山顶已经很近了，我们很快就爬到山顶。从山顶往下走时，人就很轻松了，而且走了一段时间后，发现周围的环境也并不是那么荒凉，有些地方还有不少树，这样情绪就完全好起来了。

我进藏时所遇到的高原反应，可以说第一次就是在这个二台子。

从康定到甘孜，我们可能走了七、八天，或是十来天，具体时间我已经记不清了，那时已是七八月份，我调入西藏工作团一分团当支部书记是在康定确定的，从

新津出发一直到雅安都没有确定。

西藏工作团是这样组织起来的，一部分或者说主要的部分是中央西藏工作团，中央西藏工作团是在北京组建的，也叫藏民研究班，藏民研究班是中央民委组织办的，民委将原蒙藏委员会、蒙藏学校、内地的一些藏族青年学生以及原国民党在西藏工作过的人员，组织到一起，办了这个藏民研究班。关于这个藏民学习班的情况，据多杰才旦同志回忆，早在国民党时期，在无锡建有一所边疆学校，主要招收少数民族学员，这所学校里就有些藏族学生。解放战争后期，二野解放了无锡，将边疆学校的学生送到北京大学东语系学习，49年又成立藏民研究班。这个班上的学生有格桑益刚、雍佩扎西、格桑群佩、罗格扎西、张弟华和张弟文等人，他们最早都是无锡边疆学校的藏族学生。藏民研究班还将在京的与西藏有关的人员组织起来，其中包括一些南下工作团的藏族，如达瓦、僧仲南杰等人。另外还吸收了国民党时期蒙藏中学、蒙藏委员会的工作人员，如肖重湘、白玛康珠、仁正泰、仁回春等人。研究班还吸收了几位汉族同志，如梁汝诚、李宗清等同志，梁汝诚在北京读大学期间加入党的地下组织，大学毕业后在北京市妇联工作，李宗清是青海人，原在北师大文学系读书，是地下党外围组织民青的成员，她进藏前也已经在北京市总工会工作了，她和梁汝诚一样，都是自愿参加藏民研究班的汉族同志。汉族同志还包括李振凌、潘容华等同志，李振凌毕业于清华大学经济系，潘文华是国民党蒙藏学校的毕业生。还有马万里，他是青海藏族，刚解放时在湖南某流亡大学读书，后来到北京也进了藏民研究班学习。研究班成员的文化水平一般都比较高的。中央决定进军西藏后，民委就将这个研究班和其他一些青年组织成一个中央西藏工作团，团长是韩戈鲁，副团长马扎布是位蒙古族，在民委工作。中央工作团一共约有三十多个人，他们先到新津，然后是雅安，在5月份抵达康定。

工作团进藏的途中，又在川藏沿途吸收不少青年学生。所以，西藏工作团抵达康定之前，已经有不少人参加进来。据我们了解，当时巴塘地下党就为我们输送了一批青年学生，巴塘地下党当时有一个外围组织叫作“东藏民青”（东藏民族青年团的简称），巴塘地下党为我们输送的青年学生里面有党员，也有“东藏民青”的成员。总之，这批人也跟着到了康定。从内地来的中央西藏工作团的蒙藏学校的青年学生里面，也有不少人原是巴塘人，当时从巴塘来的青年学生很多，一批一批的，都陆续加入了西藏工作团。平措旺杰也是这段时间到康定来的，平措旺杰是巴塘共产党的创始人，西藏工作团里有大量巴塘地下党输送的干部，应该说平措旺杰是做出了重要贡献的。平措旺杰当时参加南路先遣支队的进藏工作，后来中央决定让他担任中共西藏自治区工作委员会委员。西藏工委成立时，天宝同志曾是委员，后天宝留甘孜自治州当主席，工委委员一职免了，由平措旺杰补任工委委员一职。

西藏工作团从甘孜开始由天宝担任团长，王其梅任政策研究室主任，阿乐是政